

# 唐以前中国文献目录分类的沿革

[作者] 景遐东

[单位] 湖北师范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

[摘要] 先秦时期是中国文献目录分类的准备阶段,出现了重要的学科及学术分类观念;两汉时期是文献目录的创制阶段,刘向父子、班固等人始创立具体实用的目录体制;魏晋至隋唐为文献目录研究与应用的兴盛发展阶段,出现了许多重要的分类原则与方法。其中最重要的是西晋时期四部分类法的出现,其后经许多学者的不断调整与改进,最终完成了经、史、子、集之定制。

[关键词] 文献,目录,沿革

以经、史、子、集四部对众多图书文献进行分类编目,是我国古代悠久而最为重要的文献目录分类方法。其方法的产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与准备过程,它的形成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化与学术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古代中国文献目录学者智慧的结晶,充分体现了中国文献目录分类的特色。本文拟对唐代以前中国文献目录分类观念、原则及分类方法进行一番梳理,旨在弄清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及其他重要的文献与目录分类法的产生、沿革过程。

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有了初步的文献及学术分类,尤其是战国,百家争鸣诸子著述立说学术极为兴盛,学术分类亦随之而兴。《尚书》作为上古流传下来的最早的历史文献汇编,就以体分为典、谟、诰、誓四类;产生于战国初年的《左传》所记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则很与日后的文献分类相似;孔子授业诸生,内容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别类,已经是很清晰的学科分类了。《庄子·天下》分当时学术为七派,不仅辨析各派之倡导者,还概述各派之学说之大要,评价其得失,这几乎就是后来文献目录的基本体例。《韩非子·显学》中记:“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准确地说明了其时儒家、墨家学派的发展状况,另也可以认为韩非子对学术大类之下分支小类的注意。另外像先秦时期士大夫学习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也是比较清晰的应用科目的分类。

此时最值得注意的《诗经》作品的分类。《诗三百》以诗之不同音乐特点分305篇诗歌作品为风、雅、颂三大类,在“风”、“颂”之下又以作品的不同产地划分小类,即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等十五国风;周、鲁、商三颂,在“雅”下按照音乐的不同和产生时代的远近分为小雅、大雅。这是先秦时期重要的学术分类,虽然我们现在看到的《诗经》是汉儒所传,并非原先之《诗》,但大体面貌不会与之相去太远,而且先秦典籍中记载风、雅、颂者甚多,如《周礼·春官》就有“六诗”的记载:“太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诗经》作品的分类应该对后世目录分类有着重要的影响。显然,这一时期应该看作是中国文献目录分类的准备阶段,此时尚无实质性的文献图书分类,但其间出现各种重要的学科及学术分类观念,对日后的文献分类原则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汉代是经济文化极为兴盛的大统一时代,文献典籍日益丰富。汉中央朝廷极为重视图书、文献的搜集利用。汉代初年,汉武帝、汉成帝均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地征集图书,各类图书随之充集掖廷。《汉书·艺文志》载“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在文化繁荣学术著述大兴的基础之上,中国古代文献的分类、编目、辑录的研究与应用也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出现了划时代的成果。其代表就是刘向、刘歆父子的《别录》、《七略》的出现。作为对所有文献图书的最早综合性的分类目录,《别录》、《七略》不仅是秦汉以来文化繁荣学术进步的具体体现,而且它适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以清晰

完整的目录分类观念、原则对此后中国的文献目录分类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诚可谓筚路蓝缕，泽被后世。

刘向作为当时朝廷众多整理国家文献图书的学者，除了专门校录整理经传诸子诗赋类文献之外，还负责整个整理图书的考订辑录工作，“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此外则是任宏负责校兵书、尹咸校数术、李柱国校方技，这个分工很值得注意，它是基于当时的学术性质而形成的文献分类原则，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这一分类项目及顺序，与《七略》的分类基本一致，只是“数术”与“术数”不同罢了。从此可以看出汉代学者对不同学术性质流派的认识，同时也反映了他们心目中的文献分类观念，这种观念实质上就是学术分类应作为图书分类的依据。这是极其重要的贡献，事实上中国后来数千年的各种图书分类方法，实际上都是极力贯彻这项原则的。

刘向的工作持续了近二十年，有人将他撰写的书录结集为《别录》，此书可以视为当时文献图书的提要书目总编。刘向卒后其子刘歆继承父亲的未竟之业，在《别录》的基础上，按图书的性质及著述的先后顺序，撰成《七略》，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正式的综合性的图书分类总目录。《七略》分文献为六大类，另有辑略总冠全书，概述学术的发展源流及文献书籍之收集整理过程与存世的情况，属于各类图书序录之汇编，显然不是文献的一大类。所以我们可以视《七略》为图书目录的“六分法”。其大类下又分为若干种，属于细类、小类。种下则有家，属于目。这样类、种、家就构成了刘向六分法图书文献分类的结构主干。这一结构体例是非常严谨且条理清晰，在当时可以称得上实用便利的文献分类目录。

《七略》不幸亡佚，值得庆幸的是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基本上沿用《七略》而编成，这样《七略》大致内容也就因之得以保存。《隋书·经籍志·总序》对之有详细的记载：“光武中兴，笃好文雅，明、章继轨，尤重经术。四方鸿生巨儒，负帙自远而至者不可胜算。石室、兰台，弥以充积。又于东观及仁寿阁集新书，校书郎班固、傅毅等典掌焉。并依《七略》而为书部，固又编之，以为《汉书·艺文志》。”

《汉书·艺文志》是现存最早的最完整的古代目录书，它虽主要依据《七略》，但仍然有其新的东西，班固自己就在《总序》里说“今删其要，以备典籍”，对七略进行了删减加工。《汉书·艺文志》的目录分类也分为六类，与《七略》的六略分类相同，但是辑略这一部分的内容却散入各种类书目介绍之下，这样叙述学术源流就显得非常精当合理。《汉书·艺文志》所收录书籍文献的数量空前增加，其六大类目下共收录 38 种 596 家，计 13269 卷。值得注意的是它把文艺略置诸全志之首，在诸子略中把儒家放在诸子之前。这一变化，反映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之后，儒家在国家政治文化生活中的统治地位开始形成，同时经学繁荣的状况。《汉书·艺文志》中六艺略共录 103 家，计 3123 篇，诸子略中儒家 53，计 836 篇，合计 156 家，3959 篇，占这个六略 596 家的 26%，占 13269 卷的近 30%，与之相对照，《汉书·艺文志》中的诗赋略只有 106 家，仅 1318 篇，只及六艺儒家的三分之一。可见，汉代及此前文学创作的状况，文学创作并不是十分普遍，文学还依附于政治、哲学、历史等学科未获得独立地位的事实；而且文体也比较简单单一，只有诗、赋；著作形式也比较单一，尚无别集与总集之分。另外，后来成为文献学术之重要大部类的史部，在《汉书·艺文志》中仅是以小类附于六艺略中春秋家后，史籍在汉志中无独立地位，反映此时史学尚不发达，史籍著作较少的现象。可以说，两汉时期是中国古代文献目录分类的具体形成阶段，刘向父子、班固等人始创立的具体实用的目录体制，对后来的文献目录分类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文化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纸张逐渐取代了简策缣帛而成为主要的书写材料，文献著述流传更方便。文学终于脱离政治、哲学、历史等学科取得独立的地位，进入“自觉”的时代。这一时期，专门致力于文学事业的文人日益增多，文学创作、鉴赏品藻之作日众，文学形式也日渐丰富。史学此时更得到充分的发展，史书叠出；而对中

国文化产生深远影响的佛教道教迅速流播风行朝野，佛教典籍译著大增，道教著述也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汉书·艺文志》的分类编目已经不能适应新的文化学术发展的需要，以西晋荀勖四分法为代表的新的文献目录分类也就顺应时代要求而产生，文献目录学因之有了新的发展。

荀勖在《中经新簿》中将文献图书分为甲、乙、丙、丁四部分，“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虽然与后来通行之四部次序不同，但这个大分类的框架是很清晰具体的，其变革创新之意义非常重要。不过许多目录学、文献学研究者对四部创立发明权的归属仍有争议，普遍的看法是荀勖四部分类方法实有所据，即沿用了魏郑默的《中经》。据《隋书·经籍志》载：“魏氏代汉，采掇遗亡，藏在秘书中外三阁。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秘书监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全书。”后世对这段话的不同理解，造成对四部发明权的不同归属。比如，王欣夫先生认为四分法乃荀勖独创；来新夏先生则认为荀勖四分法是依据郑目而来，“四分法的创立是郑默开其端，晋荀勖毕其功。”显然，问题的关键在于对《隋书》这段话中“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的不同解释。有人认为荀勖只是“因”（承袭）郑默所著录的图书，而自创四部分类方法；也有人认为荀勖既“因”郑默著录的典籍，也“因”郑默《中经》原有的四部分类方法。认真揣摩《隋书》此处之本义，我们认为“因”的语法作用应该只关涉到“《中经》”处，下面的“更著”才关涉到“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全书”的内容，显然荀勖是借用了《中经》原有的书录，在它的基础之上另著新书录，这就是《新簿》。《新簿》将图书新分为四部分，进而总括统摄众多文献，这样使杂乱无章的书目井然有序，纲举而目张。如果按照后一种说法，荀勖全部承袭郑默《中经》的图书著录和四分法的话，《隋书》这段话中“分为四部”就应该放在“更著”之前，即“又因《中经》及所分四部，更著……”行文才合理。

其实，四分法归功于谁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在此间人们对文献分类原则及学术分科在刘氏父子以后的新认识，这样的四分法更符合文化与学术发展的实际。四部分类是中国文献目录学史上的划时代的事件，它一经确立，经过其后许多学者的不断完善，便成为中国古代流传时间最长、应用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分类方法。从隋唐到清中国最具学术价值的官私艺文志、书目著作中大多数均采用四部分类法，如《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古今书录》、《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遂初堂书目》、《直斋书录解題》、《文献通考》；《四库全书》等都承继其体制，可见其影响。

到东晋之初，著作郎李充在荀勖的基础上又对四部分类法进行了改进，“总设众篇之名，但以甲乙为次，”并且调整了四部的次序，以史部为乙部，以子部为丙部，这个顺序“自尔因循，无所变革”成为四部之固定顺序。经、史、子、集的名称与分类顺序最终确立。

在这同时及稍后的南北朝也出现了一些四分法之外的文献分类法，如刘宋王俭创立了九条分类法，“别撰《七志》：一曰经典志，……二曰诸子志，……三曰文翰志，……四曰军书志，……五曰阴阳志，……六曰术艺志，……七曰图谱志，……其道、佛附见，合九条。”这个分类法很细致，但分类原则不一，致使类目较为混杂，而且把历史类和经典类著作合一，显然不适应文化发展的实际，所以后人评价他的九条分类法“未为典则”，是指出了其不足的。梁代还曾出现了五部分类法，具体情形是在荀勖四部之外，将术数单独列为一部，合成五部，“使奉朝请祖暅撰其名”。为了特殊的目的将术数单独列为一个大类，这是很少有的，当然也不会成为典则，所以后世自然没有仿效这种分类法的。

但是除了荀勖的四部分类法之外，此时仍有其他一些很为后世重视的分类法，其中较为突出的是阮孝绪的七分法。《隋书·经籍志》载阮孝绪“博采宋、齐以来王公之家凡有书记，参校官簿，更为《七录》。”阮孝绪七录分别为：经典录、记传录、子兵录、文集录、技术录、

佛录、道录。魏征对阮孝绪《七录》的这种分类编次是持肯定态度的，认为“其分部题目，颇有次序。”阮孝绪之《七录》显然继承了刘歆《七略》与《汉书·艺文志》的传统，同时也是对荀勖四部分类法的一种改进与发展，其前四录就是荀勖的四部，数术单列第五录，而六、七录乃佛道典籍。后面的三录，是阮孝绪七分法的特别之处，它是适应了当时文化发展的趋势的。南北朝以后佛教、道教发展迅速，风行朝野，阮孝绪对佛道类典籍单独分类，也说明了他对这类典籍的重视，抓住了当时的文化特征。所以，阮孝绪是对我国古代的图书文献的分类方法的完善，尤其是小类的安排作出了贡献。

隋唐之际的魏征撰著的《隋书·经籍志》是继《汉书·艺文志》之后的又一部重要的目录著作。这以前的几部重要的文献书目，比如荀勖的《中经新簿》、李充《四部书目》、谢灵运《四部书目》、王亮、谢朓《四部书目》等俱已亡佚不存。《隋书·经籍志》是现存最早的四部分类的目录专著。所以前人非常重视这部著作，也给予其极高的评价，姚振宗即云：“四部之体，不始于本志（指《隋书·经籍志》），而四部之书存于世者，则惟本志为最古矣。”魏征充分吸取了前代文献目录研究的成果，所谓“远览马史班书，近观王阮志录”，但这只是一方面。魏征在王、阮之后是有创新的。

首先，它不仅著录了当时存有的各种文献著作，而且还记录了此前众多书籍的亡佚情况。对研究唐以前学术状况就有着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二，《隋书·经籍志》一改荀勖等人书录以甲乙丙丁顺序编次的书目的旧例，直接标举经、史、子、集的顺序进行书目编次。这就使书目分类变得直观显目，也更便于读者使用。

第三，魏征承荀勖、李充之后，给史籍以独立的地位，将其列之于经部之后，充分反映了当时史学的兴盛状况。《隋书·经籍志》著录的史部的内容比以前的书录更加丰富，共录十三种，八百一十七部，一万三千二百六十四卷，已经远远超过了《汉书·艺文志》的著录数量。

第四，《隋书·经籍志》在大部类下的小类的编排与划分非常合理，堪称经典规范体制，几乎成为后世目录小类编排的定规。《汉书·艺文志》六大部类三十八小类，阮孝绪《七录》七大部类七十六小类，《隋书·经籍志》则四大部类四十小类，如果加上附录的佛、道两大类二小类，则为四十二小类。这样，综合前人之长，且较好的适应当时的文献与学术的实际。小类的划分适中而允当，对后世影响良多。像《四库全书总目》就分为四十四部类，和《隋书·经籍志》相当。

第五，《隋书·经籍志》小类的编排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化，如将《七录》中首列的技术录中的“讖纬”类列入了经部。这个编次的原因在于，汉代以后尤其是魏晋时期讖纬之学的流行，统治者凭讖纬假借经典附会民谣为自己掌握权力及某些特殊的政治目的提供舆论服务，所以讖纬之学深得统治者的扶助与重视，著述甚为繁富，魏征将其列入经部是合理的。再如，《隋书·经籍志》将医理、经方类合二为一列入子部医方类；将《七略》、《七录》中的“五行、卜筮、杂占、形法”合并为“五行”一类，这都避免了同类划分过细导致支离琐碎的毛病。另外，《隋书·经籍志》承《七录》将神仙、房中列入道经部，也反映了道教创立后在此时的迅速发展，吸取了中国传统的神仙、房中的理论方法的状况。但是，《隋书·经籍志》对于道经知识记录经卷的数量，却不详细记载书名，却也反映编纂者对它的轻视。

显然，《隋书·经籍志》不仅是现存最早的四部分类书目，而且它的编排体例已经十分完善，堪称定制，它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代文学目录分类的成熟。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文献目录分类体例的形成与定型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先秦时期是文献目录分类的准备阶段，此时尚无实质性的图书分类，但已经出现了重要的学科分类观念，对日后的中国图书分类原则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两汉时期是文献目录的创制阶段，刘向、刘歆父子、班固等人开始在文献目录分类方面创新立制，筚路蓝缕泽被后世；魏晋至隋唐初为文献目录研究与应用的发展与兴盛阶段，各家著述既渊源有自，同时又有新变与拓

新，影响深远的四部分类方法终于确立并定型。同时出现了一批成就卓著的文献目录学者，犹以王俭、荀勖、阮孝绪、魏征等贡献犹著。

## 注释

《汉书·艺文志》

《隋书·经籍志》

王欣夫《文献学讲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来新夏《古籍整理散论》，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

《隋书·经籍志》

《隋书·经籍志》

《隋书·经籍志考证》

[http://www.chl.hbnu.edu.cn/xszl/detail.asp?n\\_id=329](http://www.chl.hbnu.edu.cn/xszl/detail.asp?n_id=329)